

桑百川 等/著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actice and Debates in China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的实践与论争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桑百川 等/著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actice and Debates in China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的实践与论争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桑百川等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ISBN 7-80207-525-4

I. 外... II. 桑... III. 外国投资：直接投资—研究—中国 IV. 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4509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 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张洪林

技术编辑：蒋 方

责任校对：龙 萧

787mm × 1092mm/16

14 印张 285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35.00 元

书号：ISBN 7-80207-525-4/F·444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前 言

我国的对外开放正面临着难得的新的机遇期：

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着生产力发展、国际分工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只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对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获得更大利益。

第二，世界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构成、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发生深刻变化，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抢占科技这个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

第三，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我国赢得了—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和发展期，为我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与从前不同，既要受到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又为我国平等地参加多边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第五，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经济实力增强，从事对外经济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必然上升，抵御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风险能力也会提高。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全面参与中国的经济活动，参加市场竞争，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运行，影响着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也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涤荡着传统的思维观念，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也因此开始了逐步地和全面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伟大复兴的长征。

在外商投资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冲突，对于外商投资的不同看法和学术争论从来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外商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投资快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沉重负荷——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格局彻底改变，外商投资从主要弥

补中国供给缺口、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技术缺口、管理缺口、信息缺口等，转向与内资经济全面竞争，在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经济利益的关联和冲突都在加深，导致人们对于外商投资的认识也出现较大分歧。

由于跨国公司纷纷向中国转移制造能力，中国的许多制造业产品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制造的产品供应着世界，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白皮书，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自此以后，众多媒体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或“全球制造中心”，学者们也开始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围绕着中国是否是全球制造中心、能否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有无必要成为世界工厂或全球制造中心、怎样成为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等论题展开了激辩。

这种争论迅速扩展开来，几年来，诸如：跨国公司大量向中国转移投资，中国的外商投资是否太多；中国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积极利用外资；大量外商投资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利用外资能否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是否是失败的，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到底有多大；在外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外资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跨国公司在中国是否出现了社会责任弱化现象；跨国公司纷纷并购中国的龙头企业，是否威胁到了国家经济安全；长期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优惠政策是否应该取消，未来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应该怎样调整，等等，这样一些主要观点，都成为各界人士论争的焦点。

本书基于以上背景，在全面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功能的基础上，按照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结构再到微观、从外在影响到内在行为的逻辑，对这些争论给予正面回应，探讨我国在吸收外商投资中社会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如何重新整合，如何调整外商投资政策和利用外资的策略。

第1章，全面梳理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争论，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2章，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制造中心问题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归纳出全球制造中心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国能否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有无必要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成为什么样的制造中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怎样调整未来的外商投资政策，把利用外资与提升制造业的水平结合起来。

第3章，在归纳学术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各种不同观点做出评价，厘清思路，重新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并考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提出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以及在吸收外商投资中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系数的对策。

第4章，从逻辑层面研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的影响，回答人们对于“外商投资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疑问。

第5章，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分析。在综述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弄清外商投资技术外溢的途径和机理，并选取外资的资产比重来近

似反映外资企业的参与程度,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构造 FDI 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程度做定量考察,由此得出外商投资企业承载着多重竞争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路径的结论,提出进一步推动外商投资技术外溢的措施。

第 6 章,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考察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放弃区域均衡发展思路,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先发展富裕起来,设立经济特区并大胆利用外商投资,以及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如何传递到内地,带动全国的经济社会进步;研究外商投资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而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偏大、谋求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怎样对待不同地区的外商投资,重点探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三资”企业发展面对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 7 章,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我国在渐进式对外开放过程中,各个产业存在着开放次序上的差异,外商对我国不同产业发展的判断不同,不同产业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制造业是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我国“入世”后,外商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力度,将制造业生产能力向我国转移,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 and 变迁都起到了巨大作用,我国也因此迅速提升了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但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加大也衍生出一些产业发展问题。本章通过对汽车、制药两个重点产业吸收外商投资的分析,解读吸收外商投资谋求发展所出现的积极变化、面临的问题,找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出路。

第 8 章,在阐述全球化和跨国并购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引发的思想冲突。跨国并购是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我国利用跨国并购投资起步较晚,几经波折,并购法规逐渐规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本章在分析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的背景、状况后,评价并购带来的影响是否威胁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外资垄断,提出装备制造业应对外资并购的思路。

第 9 章,进入微观层面,研究如何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塑造自主品牌。利用外资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既催生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主品牌,也使一些内资企业在竞争中丧失了传统品牌,由此引发了国内关于创造民族自主品牌的争论。本章在界定到底什么是自主品牌的基础上,探讨外商投资与创造自主品牌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许多内资企业不愿意致力于创造自主品牌、在外商投资规模已经很大的条件下怎样创造自主品牌、政府在企业创造自主品牌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破解企业在品牌培育中“不愿为”和“不能为”两个方面的难题。

第 10 章,关注在我国“入世”后跨国公司大量向我国转移制造业生产能力过程中的外商投资企业行为的变化,抓住外商投资企业加快本土化、独资化问题,揭

示由此对我国社会经济、市场竞争格局带来的影响，指出外商投资企业本土化、独资化是一把“双刃剑”，本土化有利于扩大技术外溢，而独资化伴随着更多先进技术输出却又限制着技术扩散，这对我国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加复杂化。依此，提出我国调整吸收外商投资及配套政策的设想。

第11章，分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对外商投资企业行为的考察不能忽视其社会责任弱化现象。在资企业追逐利润和市场扩张中，在我国对外资企业监管疲软和某些法规不健全的环境下，一些外资企业频发商业贿赂事件，并出现非法逃税、随意降低劳动工资标准、产品安全不达标、向中国转移污染产业等恶劣问题。通过探讨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在母国和我国使用双重社会责任标准的根源，提出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策。

本书的具体写作分工如下：第1章，桑百川；第2章，田萍、桑百川；第3章，桑百川、李玉梅；第4章，桑百川、汪媛媛；第5章，太平；第6章，桑百川、王拾、周炳南；第7章，张媛、刘娜、桑百川；第8章，桑百川、李鹤、崔毅；第9章，桑百川；第10章，桑百川、李玉梅；第11章，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全书由桑百川统稿。

中国对外开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丰富多彩，遇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学术界的分歧不断演化，人们对于外商投资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中的观点难免偏颇或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桑百川

2006年11月

目 录

1	总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纷争	1
1.1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是否太多	1
1.2	如何评价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5
1.3	外商投资是否有利于增加就业	7
1.4	外资企业是否已经垄断中国市场	8
1.5	利用外商投资是否导致“拉美化”	9
1.6	外商投资是否瓦解了自主创新体系	11
1.7	外商投资是否挤垮了民族品牌	13
1.8	外资并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3
1.9	外资优惠政策是否应该取消	14
2	外商直接投资与“全球制造中心”	16
2.1	研究背景	16
2.2	文献综述	19
2.3	“全球制造中心”的历史对比分析	21
2.4	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的选择	26
2.5	FDI 对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的影响:定性与 定量分析	33
2.6	促进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的外商投资政策设计	40
2.7	结论	43
3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	46
3.1	文献综述	46
3.2	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53
3.3	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55
3.4	结论	57

4	外商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运行	59
4.1	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59
4.2	外商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63
4.3	外商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69
4.4	外商投资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70
5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	72
5.1	文献综述	72
5.2	外商投资技术外溢的机理	76
5.3	外商投资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定性考察	78
5.4	外商投资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检验	85
5.5	促进外商投资技术外溢的对策	91
5.6	结论	94
6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	95
6.1	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以深圳为例	96
6.2	珠江三角洲外商投资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理念	104
6.3	长江三角洲外商投资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理念	110
7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	119
7.1	外商投资与汽车产业的发展	119
7.2	外商投资与制药产业的发展	129
7.3	简短的结论	140
8	外资并购与装备制造业发展	141
8.1	全球化与跨国并购的发展	141
8.2	外资并购在一波三折中发展	146
8.3	外资并购我国装备制造企业的状况	149
8.4	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企业的特点和态势	151
8.5	如何看待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152
8.6	正确应对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问题	155
8.7	重大装备采购立足国内	158
8.8	简短的结论	161

9 外商直接投资与塑造自主品牌	162
9.1 研究的前提	162
9.2 文献回顾	162
9.3 缺少自主品牌的危害	165
9.4 创造自主品牌的障碍	166
9.5 利用外资推动自主品牌塑造的机理	168
9.6 把利用外商投资与创造自主品牌结合起来	171
10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与本土化	173
10.1 跨国公司本土化	173
10.2 外商投资独资化	180
11 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倾向与治理	192
11.1 少数跨国公司在华行贿	192
11.2 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非法避税	193
11.3 一些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偏低	194
11.4 一些外资企业产品安全不达标	195
11.5 一些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污染	197
11.6 结论和对策	198
参考文献	200

1 总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纷争

以利用外资、对外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是中国 20 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3 年中国吸收 FDI 名列世界首位。另据有关资料，2004 年中国吸收 FDI 达到 606 亿美元，2005 年为 603 亿美元。外资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中国市场上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力。

在外商投资快速增长和竞争力凸显的背景下，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不断演绎，大约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争论。20 世纪 80 年代初，围绕着中国是否应该利用外资，展开了激烈争论；1988 年前后，在“治理整顿”中，围绕着利用外资是否扰乱了经济秩序、外资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等问题，展开了新的争论；1995 年前后，在“软着陆”期间，围绕着外商投资是否威胁到了国家经济安全、垄断了中国市场、挤垮了民族经济和民族品牌等问题，掀起了新一轮大规模争论；2004 年以来，在抑制经济过热中，再次引起对利用外资的争论：中国利用外资是否过多，中国是否还应该积极利用外资；外商投资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外商投资是否威胁到了国家经济安全；外商投资是否增加了就业；外商投资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利用外资是否存在“拉美化”危险；外商投资是否瓦解了自主创新体系；外商投资是否挤垮了民族经济；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否必要等方面。^①

1.1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是否太多

1.1.1 外资依存度并非太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利用外资过多，现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利用外资的回顾与反思”纪要》，2004 年 3 月。

外资依存度（实际使用 FDI 总额占 GDP 的比重）已达 40% 以上，大大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与地区，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过高。^①

其实，“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这种说法是虚幻的夸张。

所谓“外资依存度 40% 以上”，只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 FDI 的总和占某年 GDP 的比重。但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各年使用 FDI 简单相加没有意义。外商投资企业倒闭、撤离、资产折旧等影响外资存量的因素很多，至今在国家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实际在册运营的仅有约 33 万家，有超过一半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有名无实，把各年 FDI 相加得出 FDI 总量明显夸大了存量外资规模，夸大了外资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应该是当年实际使用 FDI 占当年 GDP 的比重，比如，2004 年我国实际使用 FDI 占当年 GDP 的比重仅为 3.65%，2005 年是 3.5%。^② 因此，把各年 FDI 相加与某年 GDP 相比，是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

另外，所谓中国的外资依存度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也是断章取义。根据 2003 年和 2004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世界上 FDI 占 GDP 的比重高于中国的国家比比皆是，2002 年英国、德国 FDI 占 GDP 的比重分别是 9.5% 和 10.1%，一些转轨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很成功。2003 年 FDI 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是 25%，发展中国家是 13%，亚洲是 12%，非洲是 8%，拉丁美洲是 21%，中东欧是 18%。^③

而且，中国 FDI 占 GDP 比重还与利用外资结构有关。1985 年以来，在利用外资中，中国内地一直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其他许多国家利用外商间接投资的比重却很高，如果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综合起来看，世界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规模都在中国之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投资的多少，取决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状况和外商投资的意向，而不取决于中国内地单方面的意愿。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更多外资，但外商可能不来投资；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更多的外商投资，但外商看中中国内地市场，愿意到中国内地投资，我们只能主要利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制度，引导外商投资，间接调控外商投资的结构和规模，而无法直接规定外商投资的规模。

1.1.2 “双缺口”理论不能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

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游资增加，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外汇“双缺口”已经消失，资金十分充裕，利用外资的现实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① 陈墨：《中国的外资多不多》，《中国经济时报》2004 年 10 月 20 日，第 2 版。

② 根据中国商务部《2005 年中国外资统计》的资料计算得出。

③ 葛顺奇：《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2003 年第 3 期。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还应该继续积极利用外资。

第一,解决资金缺口并不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根本目的,外资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也不在于解决了资金缺口,而在于推动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目前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体制转轨。经验证明,改革攻坚仅靠内生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引进外商投资不断输入外部的改革推动力。

第二,即便从资金缺口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资金富裕只是表面现象,资金相对短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一方面,个人储蓄存款规模庞大是在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经济体制转轨加速、改革全面进入到攻坚阶段后,大量的冗员被排挤到劳动力市场,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也使许多职工面临结构性、摩擦性失业,就业风险加大,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保险、教育、购房等预期支出上升,由于预期恶化,人们不得不被动储蓄。

在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扩大地方的自主权,设置了预算外财政体系,即除了预算内财政体系外,还有预算外,以及允许地方政府自收自支的预算外之外的资金。但是,在改革已经全面启动了地方政府追求利益的动机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任意设立收费项目,扩大预算外收入范围,并把收入转出账外,设立“小金库”。1994年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力度,打击“小金库”,实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控制预算外资金膨胀,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便采取了“公款私存”的对策。目前个人储蓄存款中有许多就是属于私存的公款。

商业金融机构夸大储蓄存款余额,虚报储蓄数字。为了达到银行监管机构规定的控制金融风险,降低不良债权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获得上级银行的奖励,商业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储蓄所和农村信用社人为夸大存款规模,为了应付上级金融机构的检查,拆借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资金,表面上显示储蓄规模大而且坏账率低,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存款。^①

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规模大,本身就与利用外资直接相关。正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在国内市场销售,能够满足部分投资和消费需求,替代了进口产品,节约了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才使得外汇储备大量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就不得不动用外汇进口更多的投资品和消费品,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必然减少。另外,外商投资企业本身的投资和进出口活动也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和投资“双顺差”,是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

至于温州等地民间游资增加,是因为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中,有很多是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市场无处不在的短缺机会,在简单加工制造和服务领域粗放经营

^① 桑百川:《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利用外资》,《特区经济》2005年第1期。

扩张中积累起了财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短缺经济”结束后，市场竞争加剧，原有的经营领域利润率下降，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或提升技术水平，但资本所有者又不掌握适宜的技术和新领域的管理知识，其结果表现为资本过剩。这种资本过剩只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资本追求高利润率和资本所有者自身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而言的过剩，并非发展社会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已经满足、资本真的太多。正因如此，中国才需要继续积极利用掌握着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外资。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目前，中国县及县级以上财政较普遍地存在着巨额债务，累计达到 6000 亿~9000 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率超过 2%（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 3%），债务负担率（公开负债加上潜在负债占 GDP 比重）在 50% 以上，直逼 60% 的国际警戒线。正因为财政拮据，利用外资才显得更加紧迫。另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要解决窘迫的社会失业难题，资本缺口还相当大，中国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现实的迫切需求。

第三，要不要积极利用外资，实质是要不要参加经济全球化。

“双缺口”理论存在着明显缺陷，不能解释许多发达国家在资金充裕的同时大量利用外资的现实，也不能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唯一理论依据。即便中国出现如发达国家那样资金富裕、闲置资金越来越多的局面，也必须利用外资。发展市场经济和参加经济全球化才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根本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企业就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寻找市场和投资场所，外资也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合适的投资领域，中国就必须参加经济全球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存在要不要利用外资的问题了，利用外资已经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急剧扩大，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容之一。适应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选择了实行对外开放、参加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和政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参加经济全球化的既定内容。

1.1.3 结论

“双缺口”理论不能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理论依据，发达国家一般都不存在“双缺口”，但它们却在大量吸收外资。只有参加经济全球化，才是我国吸收外资的理论依据。

以参加经济全球化作为吸收外资的理论依据，并不是为了参加全球化而参加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就像发展生产力本身不是目的，参加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不是目的。但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效参加经济全球化，才能更快地提升我国社会福利水平。

在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及 WTO 的规则体系，成为我们必须遵守的律条。为

此，我国修改了一系列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法规，不断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每年能够吸收多少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愿望，而且取决于境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判断和其自身的投资能力。

就中国自身管理外商投资的手段看，除了法律手段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外，主要是运用产业政策。行政手段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约束，不仅将越来越少，而且不能单独对外商投资实行行政管制，而应主要以国民待遇原则为基础，对内外资采取同等待遇。宏观经济干预手段调节投资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商投资，而且包括所有的投资者。产业政策是管理外商投资的重要手段，但产业政策也无法控制外商投资的规模，它主要是调节外商投资的结构。我们把外商投资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类。鼓励和允许类的外商投资，规模到底多大，是我们无法左右的；限制类投资的流入是受我国经济政策约束的，但我们无法决定其投资的具体数量；禁止类投资是不允许外商投资的。综上所述，按照我国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范，外商投资的规模到底多大，并不是我们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政府干预体系能够掌控的。

就外国投资者而言，对中国投资多少，与其对中国综合投资环境的判断、自身的投资能力紧密相关。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产寻求型和政策寻求型。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决定了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增长；看中中国某些资源的优势，如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决定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增长；看中投资后的资产整合能力和由此带来的效率改进，决定了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增长；看中有价值的核心资产，资产寻求型投资会增加；政策寻求型投资则看中优惠政策、汇率的变动。我国即便取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政策寻求型的外商投资会减少，但这并不能决定外商投资的规模。

外商投资多少，受投资者能力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期，跨国公司投资能力提高，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会增加；反之，在经济衰退期，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也衰退，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随之也会减少。

我们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以为自己能够决定外商投资规模，在市场经济下是行不通的。因此，经济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资源，去研究一个既没有决策参考价值，又没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1.2 如何评价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有学者指出：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转移价格、偷逃税款；合资外方以技术、设备、品牌等投资时高估价格，造成外资实投资本金不足，侵害中方利益；在技术转让中谨小慎微，制约对中国的技术扩散效应；向中国转移高污染产业或污染企业。

外商投资对中国的经济技术进步贡献不大。^①

到底该如何评价对外开放和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有关报告，2003年中国吸收FDI名列世界首位。2004年继续名列世界前茅，达606亿美元，2005年为603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显示，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1.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29%；进出口额8317亿美元，占全国的58%；贸易顺差567亿美元，占全国的56%；引进技术83亿美元，占全国的43%；缴纳税收6349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员超过25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② 外资经济早已成为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专家经过纵向比较，概括出外资对我国的十大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资本形成、提高工业产值和增加值、提升出口规模、创造外汇、缴纳税收、提供就业机会、促进技术转移和生产力提高、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以及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③

研究外资的作用不能离开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在经济转轨时期，利用外商投资产生的制度变迁效应和制度贡献是极其重要的。外商投资推动了我国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直接改变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在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间接加速了国内企业制度变迁、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外资参与或推动着国有企业重组；创造了一些产业部门，弥补了国内市场的产业空白，增加了市场供给，为迅速消除短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外商投资还影响着中国社会总供求关系和供求市场结构，这促使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尽快建立并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产业政策，完善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体系，以有效管理开放经济，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总之，以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促进改革和发展，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考虑外商投资产生的独特的制度变迁效应，简单定量估算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是不可取的。

当然，不可否认，窗口打开了，也会飞进一些“苍蝇、蚊子”。对此，消灭掉就是了。在外商投资中存在一些问题，指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它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外商转移价格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不光在中国才有，我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抑制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外商虚报资产价值却得不到有效控制，与我国一些政府官员攀比引资规模和政绩，缺乏相应的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直接相关，需要努力治理；跨国公司是否进行技术转移是企业的竞争策略，

① 陈墨：《如何看待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0月20日第3版。

② 中国商务部：《2005年中国外资统计》，中国商务部，2006年出版。

③ 陈飞翔、王溪若、郭英：《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选择》，《财贸经济》2004年第9期。

取决于跨国公司自身利益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状况，只要我国企业竞争力提高，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加剧，跨国公司为赢得竞争就不得不把高新技术转移到中国市场，我国企业也就会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扩大外商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外资企业将高污染产业或企业转移到我国，是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企业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实，我国内资企业总体污染程度比外商投资严重得多，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应该在国民待遇原则下对内资和外资企业适用同样的标准。

1.3 外商投资是否有利于增加就业

有学者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就业的贡献并不大，尤其是目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就业挤出效应，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外资政策。

研判外商投资对就业的贡献，当然不能仅看到创造就业，而是要看到转移就业、挤出就业；不仅要看到直接就业，还要看到因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带来的间接就业。^①

根据投资与就业相互关系原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存在三种就业效应：第一，扩大就业。即外商投资既可以带来直接就业，也可以产生间接就业效应。就业是投资的函数，外商投资增加，本身会直接吸收劳动力就业；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外商投资带动的其他领域和企业就业，为东道国供货商创造出新的工作，可以间接增加就业。第二，转移就业。外商通过组建合资、合作企业，购并内资企业，使原来在内资企业就业的劳动力转变为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第三，挤出就业。即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产生竞争关系，使内资企业缩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企业职工失业，FDI挤出了内资企业原有的就业。

当然，外商投资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投资规模本身，而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即取决于投资总额中用于购买劳动力部分的比重。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增大，劳动生产率在竞争中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是绝对的减少。投资和产出增加，但就业不一定增加，甚至会减少，出现奥肯定律悖论，恰恰说明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中投资、产出增加对就业的影响是复杂的。一般说来，在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情况下，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贡献较大；而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情况下，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贡献则较小。

在我国目前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在制定外商投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

^① 在本书第4章中将对外商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进行详细考察。